

中国近代留美教育史略

黄利群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PDG

自序

留学史是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记录了中国青年为振兴中华而负笈外洋的艰辛历程。我国近代留学教育发轫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先后形成三支洪流：一支是留美、一支是留欧、一支是留日。留学教育的产生及留学生的出现，对我国近代社会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批胸怀求学救国之志的青年，冲破闭锁的封建国门，远涉重洋，沐浴欧美风雨，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他们把学到的先进科学技术引进国内，应用到各行各业，推动了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们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传入国内，推动了社会变革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化。有人赞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留学生是“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的先驱”、是“近代中国发展实业的中坚”、是“民主革命的先觉”，实不为过。留学史不仅是教育史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社会发展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的一页，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业绩。

留美是我国留学教育的先导。它是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影响下产生的，并在“新学”与“旧学”的斗争中曲折发展。近代留美大体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从一八七一年到一八八一年为第一阶段，是留美的草创时期。此时期内，经容闳创议，由洋务派主办，有一百二十名幼童分四批赴美。但在顽固派破坏下，只持续九年，就全部撤回了。之后留美冷落二十余年。一九〇八年，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以“兴学”，“吸引中国留学生”，留美出现复

兴局面。此后，到一九一九年，先后有一千多名青年赴美留学，留美进入发展时期。留美与随之出现的留欧、留日，在其组织、发展过程中，初步形成和确定了我国近代留学教育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培养目标和管理办法，为留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对自己的留学教育的研究尚十分薄弱。就专著讲，到目前为止，国内所能见到的只有上海中华书局一九二七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留学史》（舒新城著）、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留学简史》（颖之编著）、教育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留法勤工俭学简史》（黄利群编著）、辽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清代留学运动史》（董守义著）等四种。关于留美的专史尚未问世。值得提出的是，台湾学者编著了几部研究我国留学教育的专著。尽管有些观点我们不敢苟同，但从学术角度讲，还是有相当价值的。

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做为今天发展留学教育的借鉴，为了给近代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增添内容和提供参考，笔者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参阅前人留下的一些史料，撰写了《中国近代留美教育史略》一书，旨在抛砖引玉，在发展留学教育研究上推波助澜。

全书共分四章。前三章是纵写，可使读者对近代留美的发展历程有个概括的了解。最后一章是横写，目的在于总结一下近代留美的历史经验。为了给有志于此的同志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正文后附录了《近代留学教育大事年表》。

本书力图史实确凿、观点正确、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但因笔者水平有限，实难如愿，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本书成稿过程中，参考并借鉴了一些同行的研究成果，
这里一并致谢。

黄利群

1990年10月于沈阳

目 录

第一章 我国留学教育的肇因

第一节 闭锁的国门已被打开·····	(1)
--------------------	-------

第二节 “出洋肄业”乃“变局之所需”·····	(8)
-------------------------	-------

第二章 容闳倡议及幼童留美

第一节 容闳的留美倡议·····	(17)
------------------	--------

第二节 幼童留美·····	(27)
---------------	--------

第三节 留美计划的夭折·····	(42)
------------------	--------

第四节 幼童留美的影响与贡献·····	(53)
---------------------	--------

第三章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与留美的复兴

第一节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国留 学教育形势·····	(61)
----------------------------------	--------

第二节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与庚款留 美的筹备·····	(73)
---------------------------------	--------

第三节 持续半个世纪的留美热潮·····	(83)
----------------------	--------

第四节 留美学生中的团体·····	(96)
-------------------	--------

第五节 留美与我国现代科学的发展·····	(105)
-----------------------	---------

第四章 近代留学政策述评

第一节 关于留学目的·····	(118)
-----------------	---------

第二节 关于留学生资格·····	(122)
------------------	---------

第三节 关于留学管理·····	(124)
-----------------	---------

第四节 关于留学生奖励·····	(127)
------------------	---------

第五节 关于留学经费·····	(129)
-----------------	---------

〔附〕 近代留学教育大事年表·····	(131)
---------------------	---------

第一章 我国留学教育的肇因

第一节 闭锁的国门已被打开

留学教育的产生，是社会政治、经济及教育本身发展的产物。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开始同外国接触，迈开了走向世界的蹒跚步履。公元前一四〇年至一二四年，汉代张骞通西域，“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①上述诸国，大体上是今天的阿富汗、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一带。《汉书》又说，在张骞以后，汉朝“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支、身毒国。”^②也就是说，在当时地理知识很肤浅，交通工具极不发达的情况下，中国人已涉足古罗马帝国在西亚的属地。公元九十七年，汉代西域都护班超遣属吏甘英往大秦国，到达条支，临海欲渡，为安息人所阻，之后返回。^③这是古代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再一次到了波斯湾。

公元七世纪，我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全盛时期。政治、经

①《汉书》传（三）2687页。

②《汉书》传（三）2694页。

③《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184页。

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都在世界居领先地位。四大发明、万里长城、传统的伦理观念、完善的教育制度、统一强盛的国家政体，直到十五世纪前，都使西方折服。他们曾大声疾呼，对于中国“应该赞美、惭愧、尤其是应该模仿。”^①当时中国正处于自信心较强，向外看得较多的时期，因而，此后在中外交流史上又续写不少壮丽的篇章。公元六二七年至六四五年，玄奘去印度游学取经；公元一四〇五年至一四三〇年，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最远曾到阿拉伯半岛南端和非洲东部索马里一带，险些剥夺了葡萄牙人发现好望角的殊荣。

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倾慕，自唐朝以后，日本、朝鲜等国，不断向我国派出留学生。唐朝时，日本派到我国来留学的学生最多年份达五百五十多人。各国使节纷纷前来“朝贡”，还有不少旅行家、传教士辗转来到中国。史书记载，仅公元一二四五年至一三四六年这一百年间，就有七位欧洲人来中国旅游和传教。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就是其中的一位。

十五世纪是欧洲从落后中迅速兴起的世纪。商业、金融、城市迅速发展，伟大的文艺复兴在孕育，诞生了新的人文主义思想和人类应该了解甚至驾驭大自然和世界的观念。由于好望角的发现，欧洲人打开了欧亚联系的新航线，他们可以驾驶自己的船直达东亚了，从而开始了“西学东渐”的时代。公元一五八二年，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

^①见伏尔泰《风俗论》，转引自《走向世界》，钟叔河，中华书局，1985年，33页。

来到中国。他学习中国文化，适应中国习俗，结交中国士大夫，终于在公元一六〇一年得入北京，觐见神宗皇帝，获准长驻。中国一度实行开放政策，使大批外国商人、传教士来到中国。有人统计，公元一六五〇年，我国的天主教徒已达四十多万人，外国传教士多达一百多人。

当欧洲生机勃勃地从文艺复兴向工业革命进军的时候，在中国，宗法的、封建的、迷信的观念，越来越紧地禁锢着人的头脑，压抑着人的精神，使人变得更加保守和内向。公元一三八一年（洪武十四年），曾严禁近海民人制造三桅以上的大船下海前往外国买卖，“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①由于自设藩篱，中国对世界的了解更加少了。不若说无学识的芸芸众生，就是满腹经文的朝廷命官也不知中国以外的天地是个什么样子。一五八四年，利玛窦把《山海舆地全国》献给中国皇帝，有人看了竟说：“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②真是可笑已极。正是对传统典章制度的自信，对古老声名文物的自诩，对近代科学知识的无知，对世界大势的蒙昧，封建统治者关闭了国门。十八世纪初，很有作为的康熙皇帝讨嫌罗马教皇对中国教徒的繁琐禁约，龙颜震怒，敕曰：“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③差不多同时，又恢复了“海禁”，宣布将去外国居留之人“解回立斩”。中国再次进入了闭关自守的黑暗时代。

①《走向世界》，钟叔河，中华书局，1985年，19页。

②同上，24页。

③同①，32页。原文见陈桓先生辑《康熙与罗马使节文书》。

十八世纪末叶，蒸气机已在欧洲大地轰鸣，而清朝皇帝还一直认为一切外国（当然包括已工业革命的英国）都是“偏居荒远”的“化外”。这尽管是荒诞的，但却是历史的真实。一个在做国威远播，四外“夷狄”岁岁来朝的美梦，一个正急于向东方寻找市场、原料和劳动力，已做好了当外交手段不奏效时，便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的准备。

事情正是这样发展的。一八四〇年前，荷兰、英国等国曾几次派来使者，都因拒行跪拜礼，未获清帝的接见，不能从事任何外交。当满载鸦片的商船已堵塞国门的时候，清政府还有外国“兵船不得入虎门，不得备武器，不得带女人，不得雇中国仆妇，不得乘舟游江上，每月惟三个人日准游花园，且须带翻译”^①的限令。急于打开东方市场的英国，对清帝国妄自尊大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所以，当清政府一再采取不合作态度并有林则徐虎门销烟之举时，英政府便采取了先兵后礼的作法。大清的尊严在鸦片战争中一落千丈，其腐败无能在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闭锁的国门被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轻而易举地打开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虽然答应割地赔款，但其政策并未根本改变，这就引起了资本主义列强新的不满。他们为了扩大已取得的利益，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自此，中国门户洞开，资本主义列强纷至沓来。清政府要继续闭关锁国，孤立于世界之外已势所不能。正如马克思所说：“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与外世完全隔

^①《中国近代留学史》，舒新城，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194页。

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①这一解体，乃是传统社会的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当清朝统治者对鸦片战争的炮声尚惊魂未定的时候，朝野上下已开始思索中国的出路。有的人不愿正视现实，妄图扳着历史车轮倒转，恢复昨天的局面；有的害怕这个现实，主张既然力不如人，只好结人欢心求得一时苟安。然而，有五千年文明史的诺大中国不乏人才。一部分有识之士发表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不同凡响的政见，率先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林则徐“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并购买新闻纸。”^②并把翻译的有关西方的历史、地理、政治等材料编辑了《四洲志》一书。另一代表人物魏源还编辑了《海国图志》一书，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历史、地理以及战船、洋炮、水雷等西方自然科学和军械制造知识。他认为：“中国智慧，无所不及”。只要中国人民励精淬志，奋发有为，就能“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③至于早期改良主义者则进一步提出了“学西学”、“鉴诸国”的主张。郑观应认为：“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而已，

①《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2—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②《中国近代教育史》，陈景磐，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22页。

③《中国近代教育文选》，陈学恂，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2页。

强在学中国之学又学其所学也。”^①王韬甚至预言，只要中国能向西方“借法以自强”，不出数十年，就一定能与列强并驾齐驱，屹立于世界。这些见解是我国爱国史上宝贵的思想资料，为向西方学习制造了强大的社会舆论。

然而舆论毕竟是舆论。长期封闭的社会使得人们对于外界极度无知，而无知造成的偏见和固执又加深了敌视一切新事物的病态心理，因而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起步是缓慢的，迫不得已的。

洋务运动兴起后，清政府才察觉“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②是时才感到有必要派人出国考察，以便熟悉外国情形，“探其利弊”，做为办理外交的参考。

一八六六年，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告假回国，建议中国正式派代表随同前往，考察西方各国的政治民情，被清政府接受。组成了由前知县斌椿为首的五人考察团。团员有凤仪、张德彝、广英、彦慧。该团当年正月二十一日离开北京，三月十八日到达法国马赛，先后考察了法、英、荷、汉堡、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汉诺威、比利时等十一国，历时一百一十多天，沿途“将所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详细记载，绘图贴说”。斌椿还写了《乘槎笔记》，张德彝写了《航海述奇》，介绍了沿途观感。这次考察，既了解了外国可学之处，也增进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

一八六八年二月，清政府任美国人蒲安臣为首席使者，

①《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舒新城，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下册，907页。

②《洋务运动》（二），中国史学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页。

满官志刚和汉官孙家谷为副使，聘英人柏卓安和法人德善为左右协理，组成“蒲安臣使团”，经由日本，去欧美各国“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团“在外三年”，“周游十一国，往返十万余程，奉命而往，抱节而归。”^①不但处理了与所到国的一些外交事务，而且考察了各国的政治、风俗，研究了世界局势，取得了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感性认识，增进了中外了解。志刚著有《初使泰西记》一书，记述了这次出使的情况和观感。

与政府派出考察团、使团的前后，非官方出国考察的也有人在，一个是鲜为人知的林鍼，一个是名声显赫的王韬。

林鍼，福州人，生于一八二四年，家道中落，迁居厦门，在与外国商人和水手的交往中，他学会了外语，靠在洋商那里担任翻译谋生。一八四七年春天，林鍼“受外国花旗聘舌耕海外”，二月由潮州起程，六月抵美，在美国工作一年多，一八四九年二月才回国。他本人撰写的《西海记游诗》、《西海记游自序》，便是他此行的实录。

王韬（1828—1890），江苏人，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一八六一年因上书太平军，被清政府通缉，在西人保护下逃到香港，到英国人理雅各主持的英华书院作“佣书”（翻译），从此二人交往甚密。一八六七年，理雅各回国，邀王韬同行，王韬得以在英国留驻二年零八个月，并漫游了法、俄、日等国，广泛地考察和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然科学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悉心研究了西方富国强兵之道，著有《漫游随录》，阐发了他的见闻和“所望者中外辑和，西

^①志刚，《初使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走向世界丛书》。

国之学术技艺大兴于中土”^①的主张。

当多数人在浩渺的波涛面前，对走向世界仍然踟蹰犹豫之时，这些出国者的见闻和观感，无疑催人奋进，它有如闪烁着希望之光的燭火，照跃着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征途。随着闭锁国门的打开，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代已经到来。当然，出国考察只能是走马观花，真正要在国外学点本领，是要由留学生来完成任务。然而这已是下一节所要讨论的问题了。

第二节 “出洋肄业”乃“变局之所需”

中国人认识“西学”是一八四〇年以后的事，而个别人出国留学却比这早得多。

公元一七二四年，在意大利西海岸风景如画的那不勒斯城内，创办了一所新的神学院，名字叫“中华书院”，首批学生是五名从中国去的天主教神学留学生。书院的创办者是意大利传教士，汉名马国贤。史书记载：“康熙年间，义（意）国教士马国贤以善绘油画驰名，居中国京都十有三年，供奉内廷颁赐大段（缎）、马匹等物，并发给路引。许携带学生五名，航海西归。雍正三年抵拿波里城（那不勒斯城），捐资购造中华书院。”^②中华书院培养对象，最初只有五名中国学生，后来“定例”，中国学生为二十二名，另收土耳其和希腊两国学生共十二名。中华书院的办学方向是为

^①王韬《漫游随录·屡开盛宴》

^②《十方壶斋丛钞》第十一帙，第89页。

天主教向东方扩张培养神职人员。课程以天主教神学为主课，兼涉“格致量算”等天文物理知识。中华书院的修业年限并无严格规定，一般要学十几年。中华书院自一七二四年创办，到一八九一年结束，共存在一百六十七年，培养中国学生近百人。

另一早年出国留学事例便是众所知的容闳。鸦片战争后，东南沿海的风气已逐渐开通。不少人“图识粗浅洋文、洋语，以便与洋人交易，为衣食计”^①而赴欧美留学。他们有的靠洋人赞助，有的则用私费。最早去美国并学有所成的应推容闳。容闳，字纯甫，一八二八年十一月七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西南菠萝岛南屏村。南屏村与澳门仅一水之隔。许多欧美传教士以澳门为桥头堡，渗入中国沿海进行传教活动。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在澳门开设了一所小学。一八三五年，容闳入这所小学学习。接受的虽然是西方基督教的灌输，仅学一点点英语，但却是容闳接触西学的开始。一八三九年，这所小学关闭了。一八四一年，容闳又入美国人布朗在澳门办的马礼逊学堂读书。这所学堂开设西学课程较多，有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学、地理、历史等。还学英语、音乐和汉语。这是在中国传播西学最早的学堂之一。一八四六年，布朗要回国，并决定带几名学生去美国学习。容闳和他的另两名同学黄宽、黄胜报了名。一八四七年，容闳等人跟随布朗从香港乘亨特利恩号轮船起程，途经南洋群岛、印度洋，经过好望角，横跨大西洋，经过三个多月的颠簸，来到美国。从此，十九岁的容闳开始了美国留学生活。他先进入马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奏稿，82页。

萨诸塞州的芒松学校学习。两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同来的黄胜到美一年后就回国了。黄宽在芒松学校毕业后转入英国留学。一八五〇年，容闳考入耶鲁大学。在校期间，他得到乔治亚萨伐那妇女会、阿立芬特兄弟公司和布朗夫妇的资助，并在学校兄弟会藏书馆勤工俭学，读完了大学课程。他学习努力，成绩优秀，在校内外都很有名气。他学习兴趣广泛，除完成规定的课外，还选修了拉丁文、希腊文和物理学、心理学、哲学等科。一八五四年，容闳在耶鲁大学毕业，并获文学士学位。

当时这些自发性的出国留学，如同暗涨的春潮，开创了我国留学教育的先河。自发留学生的出现，标志封建专制的清朝对于它的广大臣民已失去了往日的控制能力。下层人民为了自我谋生，为了摆脱封建压迫，通过各种渠道，几十、几百地奔向国外，表明了他们追求世界共有文明的历史主动精神。

然而，一段时间内，只有个别的、自发的留学。有组织、有计划的由政府派遣的留学并未出现。因为近代，特别是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中国对“西学”的认识和追求，经过一个马鞍型的发展过程。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口号提出的时期，是近代中国提出向西方学习的起步时期。这一时期代表人物是林则徐和魏源，学习侧重于船炮技术（主要是仿造）和著书介绍西方情况。

五十年代是西学传播低潮时期。这期间，太平天国势扫江南，各资本主义列强一再提出“修约”，随之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焦头烂额，无暇顾及“西学”。

六十年代“西学”在我国的传播出现高潮。由于洋务派的出现，这一期间在向西方学习上倒是办了几件大事，诸如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创办京师同文馆、创建海军、建立一批近代军事企业、工厂和矿山、造就一批翻译队伍。特别是围绕京师同文馆是否添设“天文算学馆”一事，洋务派在与顽固派的辩论中获胜后，洋务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对外交涉和经济活动中，洋务派深深感到人才的缺乏。首先是缺乏外语人才。在对外交涉中，因“语言不通、文字难辨”，所以“一切隔膜”。^①而当时熟悉西方语言文字的人却极其难得。我国从孟子时起，就把“华夏正音”以外的语言斥为“夷话”，学“夷话”，便会“变于夷”，读书人是不齿于此的。所以，直到鸦片战争后二十二年，才有京师同文馆之设。无怪乎李鸿章抱怨说：“互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能读我经史，于翰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馆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外国公使、领事均有译员，而中国唯有通事传语。其人通洋语者十之八九，兼识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识洋字，亦不过货名价目与俚浅文理。”^②更严重的是，这些“通事”，“流品甚杂”，缺乏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修养，“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它，惟籍洋人势力，狐假虎威，欺压贫民，蔑视官长，以求其所欲。”^③所以，培养“通晓外国语言文字”之人，便成了“当务之急”。

①《洋务运动》（一），中国史学会，上海人民出版社，8页。

②李鸿章《请设上海学馆折》。

③《走向世界》，钟叔河，中华书局，1985年，90页。

其次，缺乏军事人才。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军事力量还基本停滞在大刀长矛的水平。由于长期闭关自守，对外国战斗力不甚了了。后来曾与英国人打了不少交道的耆英，竟说“英人夜间目光昏暗”。骆秉章奏称英兵上身刀不能伤，但以长槌俯击其足，应乎即倒。就连林则徐都说：“夷人除枪炮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①直到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交手，才领略了资本主义列强的厉害。洋务派惊呼：“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②他们归纳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之法。当时西方的军事技术已相当进步，“枪则有前门、后门、单响之殊；制炮则有前膛、后膛、铜、铁、纯钢之异；炮台则有明式、暗式、泥土、三合土、铁铸之分；战舰有蚊船、雷船、碰船、快船、铁甲船；水雷有伏雷、行雷、杆雷、鱼雷、火雷；火药则有炸药、棉药、饼药、栗药，新奇叠出。”^③对这些，当时中国不若说制造，甚至闻所未闻。是时，资本主义列强咄咄逼人，国内农民起义愈演愈烈。为了对外抵御侵略，对内实行镇压，如何提高国家军事力量，成了清政府急待解决的头号问题。倒是曾国藩有高见，他说：“驭夷之道，贵识夷情”，“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是“救时第一要务”。这就把培养军事人才做为“当今急务”提了出来。

①同11页③，62页。

②《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46页

③《皇朝经世文编》，上卷三，学术三，43页